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 术 讨 论 会



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再次破产

鲁 兵 陈川豪 向新荣

中共海南省海口市委党校

1991年7月

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再次破产

内 容 提 要

抗战胜利后，在围绕着建什么国的问题上，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提出了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的主张，并且在1946年1月的旧政协会议上通过。这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作为一面政治旗帜再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其出现当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

战后，中国何去何从？取决于当时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这场较量的本质是建什么国，即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国共双方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不会允许中间力量去实现他们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战后，美国推行独占中国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也打破了中间力量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中间力量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得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缺乏实现其所需要的强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因而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的再一次破产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总结，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确实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抗战胜利后，正当中国最大的两种政治力量——国共两党围绕建什么国问题展开激烈而复杂斗争的时候，自诩为“第三者”的中间力量却于国共两种建国方案之外，另树一帜，提出了“民主建国”，即资产阶级建国方案。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把资产阶级建国方案明确摆到中国人民面前。其主要内容有：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①这种民主国家在“民主制度的运用上”，将“英美的议会制度”作为“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宝贵参考资料”，并“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②。“国家确认人民私有财产”，除银行、交通等外，“其他一切企业均可由私人经营”。国家政体实行国会制，内阁制和司法独立。“县设县议会，省设省议会，中央设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机关”，国会“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合组之”，“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采内阁制”，

“司法绝对独立，不受行政及军事之干涉。”^⑤十分明显，这个建国方案的实质是：在国体上，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政体上，实行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这是一个“十足道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一方案于1946年1月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被通过，从而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作为一面政治旗帜再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资产阶级建国方案战后在中国再度出现，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一，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为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战后的世界，和平民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不仅全世界人民需要和平，美苏两个大国也需要和平。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总目标，是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独占的殖民地，成为美国抵制苏联势力在亚洲渗透、维持亚太地区平衡的重要阵地。但是，鉴于战后和平民主的潮流，鉴于国民党政权的脆弱和腐败，以及担心苏联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美国一开始并不赞成国民党蒋介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而主张通过国民党蒋介石的“改革”和一些妥协，取消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制度，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以蒋介石为中心的“联合政府”中，和平完成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以和平方式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要求国共两党“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和国民会议，以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的统一。”声明还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其基础，认为“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动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⑥为了实现这一对华政策，杜鲁门同时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使华，在国共两党间进行“调处”。马歇尔在“调处”国共两党的冲突中，鉴于国共双方在国家政权和军队问题上的对峙，企图利用中间力量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影响”。他希望中间力量“团结与组织一个自由分子的集团，使他们能够在两党之间，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平衡力量……这个集团可以站在国共两党之间，使它们两党在没有它的支持时不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⑦苏联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它担心中国的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苏在亚洲大陆的直接对抗，危及自身的利益。因此，苏联当时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对调解国共双方的冲突表现出兴趣。在国内，国共两党两个建国方案的斗争处于相持状态。这些国际国内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历史的合力，驱动了中间力量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新尝试的热情。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⑧，要抓住这个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其二，提出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中间力量，其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与它们相联系的知识分子。这些阶级、阶层按其阶级本性来说，其政治主张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

和国。只要这些阶级、阶层存在，就有出现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阶级基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抱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并没有泯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他们还在寻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并在他们认为有利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大革命期间，他们曾寄希望于国民革命和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们追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但是，蒋介石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南京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但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企图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集结第三种政治势力，走“中间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第三党及其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重新组织起他们的力量，建立起代表他们政治要求的政党——各民主党派。从总体上看，在抗日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能够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坚持抗战，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仍在国共两条道路之间走“中间道路”。抗战胜利后，由于国际国内出现有利于他们活动的形势，他们便认为时机已到，再次明确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其三，抗日战争，特别是旧政协的机缘，使中间力量的政治组织得到了发展，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出现有利于中间力量的变化。大革命失败后，只有一个第三党。“九一八”事变后，新出现了致公党、救国会四个民主党派。全面抗战爆发至旧政协召开期间，又先后出现了民盟、民建、民促等八个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的发展壮大，客观上造成了它们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成为国家政治生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特别是旧政协召开期间，由于国共两党当时在力量对比上处于某种均衡状态，中间力量成为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其地位和作用愈发显得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中间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及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他们错误地认为只有他们能够代表大多数民意，是左右时势的决定因素。罗隆基在《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一文中说：“中国要防止内战……唯一办法，只是第三个有力的大政党产生，以缓和国共两党的武力对峙与冲突”。他认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是新生产力的产生。这新的力量站在新的立场，提出新的方案，以应付新的环境，从解决当前一切现实的问题”。“假如有一个第三大政党，他真正代表民意，他在两大政党间有了倚轻倚重的平衡力量。”^① 周鲸文也在当时重庆的一次民主人士聚会上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惟有他们才“毫无惭愧的足能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力量。”^② 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把其政治主张端出来，就会一呼百应，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就会跟着他们走资

本主义道路。正如周恩来同志当时指出的，“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资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⑧

战后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能否走得通？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历史命运如何？开始，中间力量对此充满信心。他们办刊物，写文章，发宣言，异常活跃。由于中间力量的方案中，包含着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进步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当时争取和平民主、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有共同点。为了争取广大的中间力量，迂回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案，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同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而国民党蒋介石出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和政治需要，也极力拉拢中间力量，作出某些妥协和让步。这就造成了中间力量的建国方案在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处于上风的假象，为此，中间力量感到振奋。特别是旧政协通过他们的方案后，中间力量更是踌躇满志，欢呼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和“崭新的时代”^⑨。但是，历史并不按照中间力量设计的政治轨道发展。就在中间力量欢呼他们路线胜利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在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内战，把中国引向黑暗。政协决议墨迹未干，国民党特务就接连制造较场口事件、捣毁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和《新华日报》、捣乱北平军调处等破坏协议决议的事件。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然要求“妥筹补救”，修改政协确定的宪章原则，准备将政协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宪自治等基本原则完全推翻。接着，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调遣军队，破坏停战协定，并在其认为内战准备好后，彻底撕毁政协决议，于6月悍然发动全面内战。10月12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后，蒋介石下令召开伪国大，彻底暴露其坚持独裁的面目。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向不屈从他们的民盟等中间力量开刀。加紧对他们的迫害。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某政治观察家的谈话，称民盟等民主党派“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成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⑩。14日，国民党新闻局长公开指责民盟“与反叛政府之中共”“有密切关系”。^⑪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10月27日，国民党内政部发言人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这样，曾经喧嚷一时的资产阶级建国方案，很快就毁于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的炮火中和迫害的刀口下，重演了历史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的悲剧。而中间力量的大多数人，也在现实面前，放弃了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主张，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如果说，辛亥革命期间的资产阶级建国方案，还能孕育出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并在经历袁世凯篡权、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扭曲、变形之后，尚能留下一个虚有其表的空壳

的话，那么战后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出现，则是昙花一现，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历史痕迹，遭到更加惨痛的厄运。

当然，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民共和国”建国方案，最终战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建国方案在中国注定是要破产的。

首先，战后的中国，建什么国的斗争，本质上“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场斗争中，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是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国共双方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不会允许中间力量去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早在它的“二大”上，就已提出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纲领。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并首次完整地把“人民共和国”的方案摆到中国人民面前。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依据对战后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变化的科学分析，在“七大”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①的政治路线，再次明确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案。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允许革命胜利后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何在旧政协会议上支持中间力量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呢？这种现象，必须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适时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争取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案。但是，囿于当时各种客观因素，“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案不可能在政协会议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考虑到中间力量的“民主建国”方案具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反动方针的进步作用和有利于解放区新民主主义制度发展的方面。为了争取中间力量，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在旧政协会议上，基本上同意中间力量提出的方案。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赞成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是想把中间力量的建国方案作为一种过渡，通过迂回的道路走向新民主主义。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虽然旧政协决议和“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

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方向发展。”^③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本质保持清醒的认识,充分做好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准备,并在国民党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的时候,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使“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在中华大地上成为现实。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由他们去领导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理所当然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走向社会主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既不会容忍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也不会允许出现一个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战后,独裁、内战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心目中,共产党是他们的心腹大患,欲必除之而后快。抗战后期,蒋介石就多次对来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美驻华大使赫尔利等大谈共产党的威胁,露出要铲除共产党的杀机,以至使美国感到国共冲突“势必酿成内战”。^④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加紧调运军队,积极准备内战,但是,由于战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牵制,国民党蒋介石不敢贸然发动内战主要有:第一,美国的压力。赫尔利辞职后,美国调整其对华政策。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的声明,表示美国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马歇尔使华调处初期,也劝告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希望他实现政治民主,和平统一中国,并批评他的武力政策。为了迫使蒋介石同美国保持一致,马歇尔还表示不帮助国民党蒋介石运兵到华北诸地,不实行和平民主就不给国民党政府新的大规模贷款。美国的强大压力,抑制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意图。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力量。战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远非战前所比。它拥有120万正规军和200多万民兵的武装力量和1亿人口的解放区。国民党蒋介石要发动内战,不能无视这个强大的力量。第三,国民党蒋介石需要一个准备内战的时间。抗战胜利来得如此迅速,使得国民党蒋介石无法将其远在西南的主力部队一下运到内战前线,特别是在东北,出现了国民党军队没有一兵一卒的“真空”。另外,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必需的美援,也需要时间才能实现。因此,国民党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发动内战的时间表。由于上述因素的牵制,加之蒋介石也抱有借助美国的作用,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和平吃掉中国共产党的幻想,故在战后伊始,也做起“和平”的表面文章,大谈“和平建国”。在同中国共产党展开的“和平”斗争中,国民党蒋介石亟需拉拢中间力量,既为了替它的独裁政权涂上“民主”的色彩,又为了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共产党,取得主动地位。因此,国民党不惜以高官厚禄拉拢民主党派,以至忍痛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让政协会议通过民盟提出的建国方案。但是,这也决不意味着国民党蒋介石容许资产阶级共和国

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否定。在历史上，国民党蒋介石历来实行“党外无党”的政策，反对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当民盟筹建时，蒋介石就极力反对，宣称：“我们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上的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④政协会议虽然通过了民盟的建国方案，但国民党蒋介石却耿耿于怀。政协会议最后一天下午，国民党中央常委举行会议，谷正纲、张道藩等大哭大闹，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了！……宪章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章破坏无遗了”。^⑤公然反对政协决议。蒋介石也表示对宪章不满意，流露出修改政协决议的企图。特别是对于多数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更是怀恨在心，伺机加害。果然，一俟他们做好内战准备，便向拒绝充当他们附庸的大多数民主党派开刀，使中间力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化为泡影。事实证明，中间力量不是决定战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政治力量。旧政协期间出现的中间力量的所谓“胜利”，不过是各种政治力量间一种短暂妥协的产物。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条件下，这种妥协是维持不久的，因而也就没有中间力量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余地。

其次，美国战后推行独占中国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打破了中间力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在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中，核心是“独占”和“扶蒋”。独占是战略目标，“扶蒋”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因此，美国可以根据国际和中国国内情况的变化调整政策，但是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却是死抱不放的。战后，美国对华政策面对三种可能的抉择：（一）完全摆脱一切牵连；（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⑥第一种抉择意味着完全抛弃国民党蒋介石，这显然违背美国对华战略目标，因此是美国政府不愿采用的。在抗战期间，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堕落腐败，丧失民心，“以至在战后竞争权力时会证明它竟无力维持其权威”。尽管如此，为了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美国政府“仍旧继续全力援助国民政府”。^⑦第二种抉择虽然“吸人心目”，但“由于国民党部队的无能”和中国人民不允许，“完全不能实行”。^⑧经过再三的权衡利弊，美国政府采取了第三种抉择。即一方面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另一方面通过“调处”设法使国民党蒋介石变内战政策为“和平的政治谈判”政策，使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这一政策特点是扶蒋溶共，它的目的并非要削弱国民党蒋介石势力，而是要“保持甚至加强国民政府势力”。^⑨国民党蒋介石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并不完全领会美国的这一番苦心。在国民党蒋介石看来，当务之急是消灭共产党。他们认为，马歇尔的“调处”造成了中共的态度更趋强硬，使国民党政权趋于削弱，^⑩因此对政治解决不感兴趣。尽管起先

在美国的压力下，很不情愿地接受政治解决的方式，但仍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②在行动上对美国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并最终不顾美国的劝告发动了内战。国民党蒋介石的行动，使美国感到尴尬和不满。但美国还是转而扶蒋反共，全力援蒋内战。美国不仅把大量的美元、军火源源不断地送到国民党蒋介石手中，而且用飞机、军舰把国民党军队运到内战前线，甚至派出海军陆战队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夺战略要地。据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供认，美国政府以赠予和借贷方式给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的援助总数约达二十亿美元，等于国民党政府货币支出的50%以上。此外，还将总值约十亿美元军用与民用的剩余物资廉价售以国民党政府。直至1948年10月底，当辽沈战役即将结束，淮海战役随即开始，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国政府万然宣称：“只要国民党政府继续成为中国舞台上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政府一定还是继续支持它。”^③战后中国的历史证明，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本质上说，不但不能把中国引上“和平”、“民主”、“统一”的道路，相反，助长了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气焰，最终把中国拖入内战的深渊。不错，马歇尔使华期间，曾向中间力量频频送秋波，鼓励他们充当国共的调停人，拉拢他们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甚至希望他们取得“领导地位”。但是，如果据此认为美国会支持中间力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主张，那就大错特错了。马歇尔讲得很明白：“我一直努力利用我的影响争取通过一部符合政协精神的民主宪法，争取在中国组织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集团以支持一个好政府，以便有利于恢复和谈和共产党重新进入政治活动的方式实现政府的改组。”^④马歇尔认为，如果蒋介石“通过他自己的间接领导作用，促成小党派的联合以形成一个自由主义派政党”，“就可以使自己高居于国父的地位而不再仅仅是国民党一党政府的领袖”。^⑤司徒雷登说得更加露骨：“假如第三方面全体参加国民大会，共产党完全孤立起来，那么我就更有理由向我们的政府建议更大规模地援助你们（指国民党）将来的联合政府”^⑥这些话道出了美国拉拢中间力量的目的：一是利用中间力量为其对华政策服务；二是孤立共产党，迫使共产党就范；三是为国民党独裁政权装璜门面，以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但是，当中间力量的大多数人拒绝美国的引诱，并批评美国对华政策错误的时候，美国随即改换了一副腔调，逼迫盟盟“光荣解散”。事实充分表明，在美国推行独占中国和扶蒋政策的条件下，同样没有中间力量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余地。

再次，从中间力量内部看，社会基础和阶级力量的薄弱，是资产阶级建国方案必然破产的内在原因。其一，中间力量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大众中影响不大。旧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是大多

数。中间力量据此就断定“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②实际上，占旧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经历了100年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后，已经选择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它们不是中间力量的社会基础。中间力量的社会基础，只是占“中间阶层”人口少数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知识分子。其二，中间力量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战后显得更加脆弱，其经济、政治力量已是“今不如昔”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年代。在抗战中，日本的侵略炮火，毁掉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大批产业，加上国民党政权和官僚资本的摧残，战后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奄奄一息，濒于绝境。迁川工厂联合会在一篇宣言中申诉了他们艰难的处境：“产品无从出售，遣散工友更费巨款，以至什九工厂变卖全部资产，犹不足偿其债务，工厂陷于停顿，经济又^{枯竭}于^{枯竭}，物资乏款运迁，人员无法还乡，问天无语，呼吁无门，以善固而致恶者，莫有甚于此者！”^③战后民族资本的这种状况，使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更加突出。以至在政治上无法形成一个象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那样较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政党，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连马歇尔也感叹中间力量无法组织成一个巩固的、具有某种影响的大组织。其三，中间力量的政治组织——各民主党派，组织松散、人数不多，成员复杂，其组织成员^中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中其成员的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④比如民盟内部，是“三党三派”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联合体。民盟内部，党派关系的影响仍很深，各党派的党员加入同盟，虽以个人资格，但其言行不能超出该党派过甚，而在同盟中原属同党派的盟员，亦每取一致的态度。^⑤“从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到民盟”一大“召开期间，民盟长期没有自己单独的办事机构，民盟的盟员人数，到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一大”时，才有三千余人。参加民盟的“三党三派”既有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青年党、国社党那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野派。民主党派的这些弱点，决定了它们的组织力量薄弱，内部存在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动摇性，很难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民主党派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最终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各民主党派都没有军队和政权，主张非武力的政治斗争。他们认为，政党而有武力，这是中国的“畸形现象。”“政治团体当然要有力量做后盾。但力量有两种。武力与群众的力量。我个人相信群众的力量终久胜过武力。”^⑥他们宣称：“绝对不用军队做政治工作，绝对不从事武力的政治斗争。”^⑦然而中国的国情是：“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⑧对于武装，蒋介石是抓得很紧的。中国共产党付出了血的代价，也懂得了武装的极端重要。中间力量想赤手空拳在中

国打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脱离中国国情的梦幻。

综上所述，战后的中国，既没有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政治经济条件，也没有实施这一方案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战后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出现，不像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黄金时代——辛亥革命时期那样光彩夺目，而只是中国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企图的回光返照。

战后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破产，再次有力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确实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回顾这段历史，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研究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破产之原因，对于我们认识今天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年来中，中国社会几度出现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但最终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行不通，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今天，中国社会更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虽然国际上西方帝国主义正在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从各方面对我国施加影响和压力，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俯首大国、仰人鼻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一个独立自主、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外来影响和压力，都不可能使它改变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国内，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扎下了根。资产阶级已消灭，而且也不会象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所期望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的土壤上重新产生。因此，一切在现代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只能是一种梦呓。

注：

①《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7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②同上，第77页。

③同上，第66—68页。

④《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28—62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⑤同上，第260页。

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71页。

⑦罗隆基：《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见《民主周刊》，第一卷 第16期

⑧周鲸文《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见《时代与批评》第11页 第86期

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3—284页。

⑩《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44页。

⑪《中央日报》1947年5月3日。

- ⑫《中央日报》1947年5月15日。
- ⑬《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1页。
- ⑭《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6页。
- 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33页。
- ⑯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第328页。
- ⑰同上，第492页。
- ⑱《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35页。
- ⑲同上，第33页。
- ⑳同上，第35页。
- ㉑同上，第35页。
- ㉒见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第56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 ㉓《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36页。
- ㉔同上，第328页。
- ㉕《马歇尔使华》，第443页。
- ㉖同上，第447页。
- ㉗《文史资料》第13页。
- ㉘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296页。
- ㉙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第439页。
- ㉚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5页。
- ㉛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第357页。
- ㉜罗隆基：《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见《民主周刊》第1卷，第16期。
- ㉝《文汇报》，1947年3月18日。
- ㉞《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